

颜之推 研究



颜之推（531—约591），“复圣”颜回之后，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文人，对南北文化、夷夏文化有着深刻体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称其为“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所著《颜氏家训》以体系完整、内容广博，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秦元 著

書社

閱 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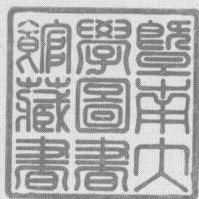
B235.95
20131

顏之推 研究

秦元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颜之推研究 / 秦元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2. 9
ISBN 978-7-5333-2678-4

I. ①颜… II. ①秦… III. ①颜之推(531—约591)—人物研究②颜之推(531—约591)—文学研究
IV. ①B235.9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0894 号

颜之推研究

秦元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
插 页 3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678-4
定 价 28.00 元

序

生活在南北朝末期的颜之推，同许多封建文人一样，是一位复合型人物。他是官员，又是学者和作家。他历仕梁朝、北齐、北周三朝，官位相当显赫。在梁朝，任散骑侍郎；在北齐，位至黄门侍郎；由齐入周，为御史上士。作为一位学者，他博览群书，该洽经史子集，同时又不局限于各种文献典籍，注意耳闻目睹社会现实和各地风物。他通晓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儒学、佛学、史学、文艺、文学、教育等。这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颜氏家训》一书中。作为一位作家，他爱好诗文，有“作赋凌屈原”的志向和气概。他勤于写作，在诗、赋、文、小说的创作等方面，都有创获。

对于逝去的各种人物及其著述，历史在记录的同时，也伴随着选择和淘汰。这也体现在颜之推及其著述上。颜之推尽管历仕三朝，受到帝王的尊宠，但从他去世以后的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很少有人注意他在当时显赫的官位和受到的帝王的尊宠。人们所看重的是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文学上的成就。他的著述，特别是《颜氏家训》和《观我生赋》，代代存传，相当完整地流传到今天。看来，对于一个封建文人，他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同他的官位相比，官位很容易被人们所淡化和遗忘，而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倒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回顾一千四百多年以来，人们对颜之推及其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著述的关注和研究，大体上可以 20 世纪初期为界，分

为前后两个时期。

综观 20 世纪初期之前,历代人们所做的主要是《颜氏家训》的存传工作。颜之推的著述,不知是什么原因,《隋书·经籍志》只著录了他的《冤魂志》三卷(载《经籍志二》“杂传”类),而《颜氏家训》虽“行于世”,但未予著录。自唐代以后,《颜氏家训》基本上是代代相传,世世刊行。在唐代,《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均著录《颜氏家训》七卷。在五代,至少有官傅和凝本。至两宋,除了唐本和五代本的存传之外,又相继出现了不少新的版本,如闽本、蜀本、嘉兴沈揆本、淳熙台州公库本等。其中特别为后人所重视的是嘉兴沈揆本。此本取闽本、蜀本互相参定,又校以五代和凝本。参加校刊的,除了沈揆外,还有林宪、赵善德等八人。又别列《考证》二十三条为一卷。沈揆等人学识不凡,他们的校刊本,当时即称为善本。在元代,见于记载的有补修重印宋淳熙本。至明清两代,《颜氏家训》的版本急剧增多。在明代,至少有正统间颜思聪刻本,嘉靖傅太平刻本,成化间程伯祥、罗春等刻本,颜嗣慎刻本,万历程荣校《汉魏丛书》本,万历间何鏗刊《颜氏通谱》本等。在清代,有康熙五十年颜星重刻明《汉魏丛书》本,康熙五十八年朱轼评点本,康熙间何允中覆刻《汉魏丛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载明刻二卷本,仿宋本,乾隆五十四年卢文弨抱经堂校订本,嘉庆二十二年《南省颜氏通谱》本,同年颜邦城三刻本,胡文焕《格致丛书》本,黄叔琳《颜氏家训》节抄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光绪间屏山聂氏《汗青簃》本。另外,还有多种影写宋槧本。(以上列举的多种版本,主要参考了王利器先生撰写的增补本《颜氏家训集解》中的《附录·序跋》)上面列举的历代的多种版本,有些是出自颜氏的后代,但更多的是由于

《颜氏家训》适合于封建社会的家教而刊刻的。这些版本使《颜氏家训》得以存传,流布较广,同时一些校勘和注疏也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0 世纪初期之前,《颜氏家训》在不断刊刻的同时,也有对其加以论述的。这些论述,主要见于一些刊本的序跋和评点中。有关的论述,几乎都是把它作为封建社会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的家庭教科书。多是着眼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强调其修德积善、敦伦之矩的训教价值。相关的论述,虽然不乏割切独到、值得借鉴之处,但总体看来,视阈比较狭窄,时代的局限性相当明显。

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的后半期,由于时代的变革和理念的进步,由于学术视野的开阔和文学观念的提升,对颜之推及其著述的重视超越以前,对其研究,呈现出多元并进的繁盛态势。研究者不仅有年长的学者,如李详、余嘉锡、杨树达、刘盼遂、周一良、周法高、缪钺、王叔岷、周祖谟、王利器等,还有许多中青年。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中外(主要是日本)出版的关于《颜氏家训》的校注翻译专著有二十多部,发表的论文有七十多篇,还有不少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专著当中。概览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有生平的探究,有文本的整理,有宏观的论述,也有微观的分析,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地超越了前一时期。如对颜之推的著述的搜集和整理,就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王利器先生的《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集以前多种校注本之大成。其他的许多论著,程度不同地都有新的发掘和阐释。

回顾以前对颜之推及其著述的研究,尽管取得了重要的建树,为后人的解读和体认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颜之推及其著述作为南北朝末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有其特殊性,其成就是

多方面的,其蕴涵是相当丰厚的。以前的诸多研究成果,即使观点是正确的,也只是揭示了其蕴涵的某些部分,有些论述止于表层,有些方面的研究相当单薄。还有些问题,仁智各见,存在分歧。就研究成果的形态而言,除了那些比较完整的校注本外,其他的成果大都显得零碎分散,有待整合。另外,时代的前进,现实的需求,也要求对颜之推及其著述继续进行探讨。秦元君正是基于以前对颜之推及其著述研究存在的缺欠,以及诸多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也基于现实的需求,选择了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现在出版的这部专著,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修改而写成的。

秦元君撰写的这部专著,尽力博览诸家,本着弥补以前研究不足的原则,力避屈旧而就新和绌新而从旧,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亦往往自出己说,有新的创获,下面略举三点:

多方位观照,对颜之推及其著述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部前人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的综合性研究专著,结束了对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等著述的研究长期没有专著的缺憾。其荟萃之功,为人们全面地了解 and 体认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诗歌、辞赋和小说等,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此其一。

重点解读《颜氏家训》,结合其他史料,认为《颜氏家训》是六朝“家训”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探寻了颜之推的思想、心态及自觉撰写《颜氏家训》的意图。指出,《颜氏家训》既体现了六朝士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又是六朝士族文化的延续。同时,也可以看到六朝士族文化的衰退。此其二。

专著最后附有《颜之推年谱》。此谱在缪钺先生编纂的年谱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考辨史料,有所补正,比较全面地、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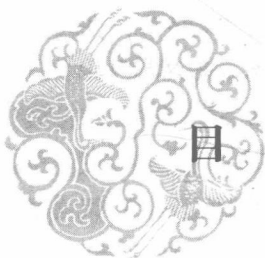
致地叙录了颜之推一生重要的经历。此其三。

秦元君重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喜爱魏晋南北朝文学。她爱好之而又努力研究之。她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其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在担任高校相当繁重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任务的同时,又坚持攻读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经过四年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题为《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研究》的博士论文。论文完成以后,她没有就此止步,也没有急于出版,而是锲而不舍,不断地阅读覃思,钩发隐曲。人常云:“天道酬勤。”秦元君多年辛勤的耕耘,终于在颜之推及其著述的研究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颜之推及其著述的研究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秦元君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敬业乐业,心无旁骛,沉潜稳重,学风端正。她富于春秋,来日正长。我相信,她不会自馁,更不会就已经取得的成绩而自限。我作为一个同道者,既为她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欣慰,同时也乐其继往而不断进取。

张可礼

二〇一二年元月 写于山东大学农子晚学斋



目 录

序/1

第一章 颜之推的生平和内心世界/1

第一节 间关南北,一生三化

——颜之推生平述评/1

第二节 “世以儒雅为业”与“家世归心”

——颜之推的儒释思想及儒释一体论/28

第三节 “自资”、自利与“自咎自责”

——颜之推心态剖析/52

第四节 “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

——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文学活动/70

第二章 《颜氏家训》研究(上)

“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浸透浓厚家族观念的《颜氏家训》/83

第一节 精神贵族的保家之念

——南北朝“家训”现象的文化底蕴/83

第二节 “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颜氏家训》之门第教育思想(上)/91

第三节 “德艺周厚”

——《颜氏家训》之门第教育思想(下)/108

第四节 常思“优闲之过”

——论《颜氏家训》对南朝士族衰败的反思/130

第三章 《颜氏家训》研究(下)

“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

——论《颜氏家训》文学成就/140

第一节 心危·虑详

——《颜氏家训》的写作意图与内容/140

第二节 同言而信,同命而行

——《颜氏家训》说理方式之一/145

第三节 指陈原委,辨正时俗

——《颜氏家训》说理方式之二/154

第四节 上下今古,类辨不华

——《颜氏家训》说理方式之三/159

第五节 南北风土,俊俗具陈

——《颜氏家训》的叙事艺术/167

第六节 《颜氏家训》的结构、体制和语言成就/177

第七节 义琐·文繁

——《颜氏家训》之艺术缺憾/188

第八节 为文之道

——《颜氏家训》蕴含的文学观念/191

第四章 颜之推诗歌、辞赋、小说研究/203

第一节 “十五好诗书”

——颜之推诗歌研究/203

第二节 “作赋凌屈原”

——颜之推辞赋研究之一/212

第三节 论《观我生赋》的叙事艺术方式

——颜之推辞赋研究之二/218

第四节 论《观我生赋》的夷夏之辨及其抒情艺术方式

——颜之推辞赋研究之三/229

第五节 “词尚体要”

——《观我生赋》自注初论/240

第六节 “释家报应之说”

——论《冤魂志》(上)/247

第七节 叙述异闻

——论《冤魂志》(下)/255

附录 颜之推年谱/268

参考书目/298

后记/302

第一章 颜之推的生平和内心世界

第一节 间关南北，一生三化 ——颜之推生平述评

颜之推(531—591?),字介,属琅邪(今山东临沂)颜氏。九世祖颜含,从晋元帝东渡,官至侍中、右光禄、西平侯。《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文中简称《家训》,正文有关篇目如不注明出处,均出自《家训》)云:“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诫兵》篇),颜氏家族自三国时颜盛“始自鲁,居于琅邪临沂孝悌里”(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学界一般认为“琅邪临沂孝悌里”在今山东临沂市费县方城镇诸满村,张霭堂《颜之推全集译注》即持此论。

自颜含至颜之推,颜氏家族在江南共历九代,《观我生赋》云“逮微躬之九叶”。《观我生赋》自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颜氏家族就在这《百谱》之内,属江左侨姓高门,在东晋南朝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颜氏家族世居建康,赋云:“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自注云:“靖侯以下七世坟墓,皆在白下。”

自颜之推祖父见远始,颜家离开建康定居江陵。南齐和帝萧宝融镇守荆州“以见远为录事参军”,及萧宝融即位江陵后,

以见远“为治书侍御史，俄兼中丞”（《梁书》卷五十《颜协传》），颜氏家族遂居江陵。《终制》篇所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的情况，意谓在颜协之前，颜家七世坟墓皆在建康。1959年06期《考古》所载文章《南京老虎山晋墓》一文认为：“这四座墓都是晋左光禄大夫颜含后人的墓葬”，而“老虎山位于南京挹江门外东北”，可以推测，颜氏家族墓地在南京挹江门外。

琅邪颜氏是东晋南北朝较少习染玄风而保持儒学传统的少数高门之一。为颜氏家族奠定发展基础的颜含，《晋书》本传称其“少有操行，以孝闻”、“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在政治上，他坚决反对门阀擅政，主张维护和振兴皇权。东晋初，颜含曾与王导就处理江南地方政治进行过探讨：

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晋书》卷八十八《颜含传》）

颜含认为要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就必须坚决削弱门阀士族的经济实力以充实国力，其意见明显表现出国家利益至上的色彩。其后，时论以王导为元帝师傅，百僚宜为降礼，颜含直言不能接受这种做法：

王公（指王导）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同上）

强硬的拒绝口吻表明颜含内心对“王与马，共天下”所表现出的门阀势力膨胀、甚至与皇权平行的格局有着强烈不满，再次表现出对皇权的尊崇、捍卫。

之推祖父颜见远事在《梁书》卷五十《颜协传》中。梁武帝篡齐而立后，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其绝食以殉旧朝

的举动令梁武帝萧衍大为不悦,云:“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六朝少死节之臣已是当时的普遍现象,颜见远这般人格,在南朝确实罕见。颜含捍卫皇权的言论和颜见远身殉旧朝的举动,客观上表明了颜氏家族内在的浓厚的儒家忠孝观念,这些言行在门阀士族兴盛的东晋南朝不免成为特例。

之推父颜协,《梁书》卷五十有传。颜见远的死无疑影响到颜协的入仕之心。《梁书》本传称他“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称颜协“以见远蹈义忤时,遂不仕进,梁元帝为湘东王,引协为其府记室参军。协不得已,乃应命”。有梁一代,家门之事促使颜氏家族与远在建康的最高统治者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使他们,尤其是颜之推能够比较独立、清醒地注意和思考国家和士族阶层的一些弊病。《家训》的不少篇章和《观我生赋》在反思故国覆亡的原因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深刻的目光。同时,这个家族“世善《周官》、《左氏》”(《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秉承儒家文化,富有礼学和史学修养。应该说这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恪守儒家传统的家族。

颜之推一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读书、出仕供职萧绎江陵集团、被俘入北。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到梁元帝承圣三年(554)。

《北齐书》卷四十五与《北史》卷八十三《颜之推传》(以下简称《北齐书》本传、《北史》本传)均未明载颜之推的生卒年。《序致》篇云:“年始九岁,便丁荼蓼。”殆指丧父而言。按《梁书》卷五十《颜协传》,协卒于梁武帝大同五年(539),是岁之推九岁,缪钺《颜之推年谱》据此考订颜之推当生于中大通三年

(531)。《终制》篇云：“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如果颜之推生于中大通三年，则年十九时为太清三年(549)，即侯景陷台城之岁，与“值梁家丧乱”相合。可知颜之推生年为中大通三年(531)是正确的。同时，《梁书》卷五十称颜协“释褐湘东王国常侍，又兼府记室。世祖出镇荆州，转正记室”。按湘东王于普通七年(526)出为荆州刺史，大同五年(539)入为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梁书》卷五《元帝纪》)，在荆州凡十四年，而颜协即卒于大同五年。协盖自普通七年(526)即随湘东王于荆州，以至于卒，则之推当生于江陵。可以说，颜协、颜之推父子在政治上与萧绎为首的江陵集团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与金陵的中央政权则保持一定距离。

颜之推自幼受到良好的士族教育。《序致》篇云：“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髻，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勉学》篇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北齐书》本传记颜家“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传家业……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当知颜氏家族整密的儒家风教与深厚的礼学、史学、文学传统滋养了幼小的颜之推。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七岁能“诵《灵光殿赋》”(《勉学》篇)、“博览群书，无不该洽”(《北齐书》本传)、“虽读《礼传》，微爱属文”(《序致》篇)、“十五好《诗》、《书》”(《古意二首》其一)，少年时期就表现出文学爱好与文学创作的热情，“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北齐书》本传)。少年颜之推也曾受到南朝士大夫放达风气的影响，“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言谈举止表现得非常自由，但这种潇洒

不羁的风度对颜之推的一生影响不大,只是其人生历程中的暂时现象,侯景之乱以及后来被迫入北的坎坷经历逐渐把这种浮华作风打磨掉了。

太清三年(549)爆发的侯景之乱不仅使梁朝由盛转衰,而且也改变了包括颜之推在内的广大士大夫的人生。次年,简文帝大宝元年(550),“(萧)绎遣世子方诸出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北齐书》本传)。颜氏从此步入仕途。《观我生赋》云:“方幕府之事殷,谬见择于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自注云:“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军功,加镇西墨曹参军。”由于萧方诸年仅十五岁,幼稚无知,其长史、郢州行事鲍泉亦极庸碌,所以,颜之推内心很苦闷,“虽形就而心和,匪余怀之所说”。初入仕途的颜之推很快目睹了侯景之乱引起的梁朝皇室内部分争皇位、剪除异己的互相残杀,那些“子既殒而侄攻,昆亦围而叔袭”、“自战于其地”的丑剧无疑又加重了他心中的忧虑和不平。

大宝二年(551)闰四月,侯景部将宋子仙、任约袭郢州,执刺史萧方诸。颜之推被俘,险遇难。《北齐书》本传云:“值侯景陷郢州,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被囚送建业。”《观我生赋》自注云:“之推执在景军,例当见杀。景行台郎中王则初无旧识,再三救护,获免,囚以还都。”侯景之乱既葬送了梁朝表面的繁荣和宁静,使无数百姓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更使初履仕途的颜之推在这场灾难中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险些名列鬼录、身赴岱宗的遭遇使他重新审视生命的内涵。这次被俘的经历对其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相比之下,早年《神仙诗》“朝游采琼宝,夕宴酌膏泉。峥嵘下无地,列缺上陵天;举世聊一息,中州安足旋”那种无忧无虑、遗世独立

的飘举高蹈,只能显示出年轻的作者对生命深层内涵的懵懂无知。战乱和死亡的洗礼很快把这种轻快然而肤浅的情绪从颜氏文学作品中冲刷掉了。

颜之推虽生于江陵,但颜氏家族世居建康,被囚建康这个特殊的机会,使他第一次回到建康得以瞻视、流连故居,黍离之悲和桑梓之痛的双重感伤共同打动了。《观我生赋》云:

就狄俘于旧壤,陷戎俗于来旋。慨《黍离》于清庙,怆麦秀于空廛……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

自注云:“长干,旧颜家巷。……靖侯以下七世坟墓,皆在白下。”残破的建康将混乱的国势和个人难以预料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引发出颜之推内心的“黍离”、“麦秀”之悲,身世之感和桑梓之痛。在这时,颜之推对导致侯景之乱的政治远因进行了深刻思考。他指出,梁武帝晚年接纳东魏降将侯景的昏庸之举,本质上就是引狼入室,“养傅翼之飞兽”和“初召祸于绝域”,为国家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初唐姚思廉著《梁书》亦批评萧衍“及乎耄年,委事群幸……遂使滔天羯寇,承间掩袭,鸢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与姚思廉的评论相比,颜之推的看法更加具体、直接地揭示了梁武帝对侯景之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示出他注重从统治集团内部探寻政治动荡原因的深刻目光。而梁武帝萧衍既然埋下了祸患的种子,最后也成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武皇忽以厌世,白日黯而无光,既殍国而五十,何克终之弗康?”(《观我生赋》)